

文理分科:历史视野下的是是非非

○柯莉群

摘 要 从清末普通中学文理分科的提出,民国时期文理分合的反复,到新中国成立后文理分科模式的长期存在,我国中学(高中)文理分科的实践与争议已走过了 100 多年的历程。在历史视野下梳理文理分科的存废之争,于当前思索文理分科的发展这一问题大有裨益。

关键词 高中 文理分科 课程

2009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把高中文理分科问题作为“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全局”的 20 个重大问题之一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即刻引发各界的热议,赞成者与反对者可谓旗鼓相当,难分仲伯。正如美国课程史专家坦纳(D.Tanner&L.Tanner)所言,“现代许多新的课程理论与改革意见都有很深的历史根源。”^[1]从历史上看,高中文理分科问题,其实是伴随着清末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发展的。若以 1909 年清政府学部奏请实施中学“文实分科”为标志,我国中学(高中)文理分科的实践和争议至今已走过 100 多年的历程了。因此,针对我国高中文理分科百年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和梳理,对我们今天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有所裨益。

一、文实分科的提出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 年 5 月 15 日),学部奏请《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开近代以来中学文理分科改革和争议之端。奏折指出小学堂不能分科,中学堂则可以实行文实分科,具体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2]:

其一,大学堂有文、实科之分。中学生毕业有志于升学者,所升的学堂有文科、实科的不同,“以分科大学言之,则经科、法政、文学科皆文科也,格致科、农科、工科、医科皆实科也;商科课程略与法科相似,实业之近于文科者也。”“以高等专门学堂言之,高等学堂之第一类,优级师范学堂之第一二类,高等法政学堂、高等商业学堂,方言学堂,亦于文科为近;高等学堂之第二三类,优级师范学堂之第三四类,高等农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商船学

堂,亦与实科为近。

其二,分科可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学实科者尤其科学之纯熟,中国文学既难,加以科学又极繁重,果能于五年之内二者兼通,岂非甚善。”通过考察各省中学的情况,发现“各省中学堂学生毕业分数,或文学优于科学,或科学优于文学,则以平日用功有倚重倚轻之故。”天资聪明,每科都优秀的人,毕竟少数。因此,实行分科教学可以减轻学生负担。

其三,分科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学生资性既殊,志趣亦异,沉潜者于实科课程为宜,高明者于文科学问为近,此关于天授者也,志在从政者则于文科致力于勤,志在谋生者则于实实用功较切,此因于人事者也。”

其四,文实分科“远稽湖学良规,近采德国成法”。一方面借鉴历史上“苏湖教学法”。另一方面,学习德国中学文实分科,“近世德国学术号为极盛,考其中学之制,文科实科则系分堂肄业。”兼有中国本土历史与国际经验的借鉴。

其五,为学生谋生考虑。清末设立新式学堂,但师资、设备等参差不齐,普通中学的教学呈现出一系列弊端,如课程的整齐划一造成学生毕业升学不成即失业,这些都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分科教学,可以照顾到学生谋生便利。“主课内所学甚深,则谋生容易,为无力升学之学生计之,当亦甚便利也。”

总之,分科是大势所趋,与其“升学之时多所迁就”,何如“于入堂之始早为区分”,与其“蹈爱博不专之讥”,何如“收用志不纷之效”。在呈交奏折的同时,还提交文、实科课程表。当然,文实分科并不是绝对的分科,有兼顾学生知识的完整性,“文科主课外,仍以算学等科扩其知识;实科主课之外,仍以读经等科培其本根,即令毕业之后不再深求,而于普通之道德知识实已完全无缺,不至有偏宕固陋之流

弊。”

二、文理分科的发展与取消

奏请得到批准约两个月,学部通咨各省提学使,限三个月内按文实分科办法,将筹定通省中学办理情形报部核办。当年十二月再次催促各省“于年底一律详报。以凭核夺。”^[3]

但是这一想法并未在全国铺开,有些省份提出不满及改进意见。如浙江省1910年第18期《浙江教育官报》,公布了本省中学堂监督会议早些时候拟定的省内中学堂办理文科和实科的分工名单,其中拟专办文科的4所,分别是宗文中学堂、太平中学堂、金华中学堂、严州中学堂;拟专办实科的5所,分别是杭州中学堂、安定中学堂、湖州中学堂、绍兴中学堂、椒江中学堂;文实皆办的只有2所,即宁波中学堂和天台中学堂^[4]。大多数学堂只是打算先办文科或者先办实科。江苏各校虽已预备分认专办“文科”“实科”,但也仅仅停留在“实行预备”,到1911年,也仅有黄炎培在调查镇江府中学堂的报告记载,该学堂“以前办法未分科,今年起改从文科”^[5]。因此,根据各省的反馈,宣统二年(1910年)直隶省提学司在回复学部的咨文时,列举了对文实分科的疑问。主要有两点^[7]:

第一,中学堂培养目标是“培育普通完全人格”,学科的程度要求不必太高。且清末的文实中学与德国文实中学相差甚远。在德国,“入文实中学之人,大抵为将来必升大学与高等、专门学堂之人。其分科程度较高,有由然也。”更者,德国文实中学年限是九年,其高年级课程程度与中国的高等学堂相当。而中国的高等学堂,“重实重文,复不一类”。而且,高等学堂也是分科教学,在中学再搞分科,对于选文科和实科的学生来说,是削弱基础知识增加所选课的程度,这与中学的培养目标相悖,“若仅至中学毕业而止,则学益趋于专一,即于普通之学识,益缺欠而不完,是与中学宗旨尚有间也。”这也模糊了普通中学与高等学堂之间的界限。再者,课程过于专业化,当时培养中学师资的优级师范程度,将不尽适宜,“现行之教科用书改定,亦尚无善本”。因此,“拟酌减程度,务使升学、毕业两不相仿,并顾兼筹”。

第二,德国文实分科程度并不大,“虽云程度具有高等之课程,而分科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者科目的上课时间也相差不多,“其余钟点,所差不过每星期一、二、三小时。”且学科富有弹性,学生中途可以转科。文科补习外国语,实科补习希拉语,彼此便可转学。学生转学如此便利,就是因为文实相差不大。而清末的文实分科相差甚远,改学甚难,“所升入之学堂,益不能出部定近文近实之类”。学生一旦“选择不慎,一误终身”。直隶提学司在批评“文实分

科”之后,提出改进的建议和两科的课程计划。

从报告可以看出,提学司在对德国中学文实分科制度上比学部有着更清晰的认识。但是正如直隶提学司所评价的那样,这个改革方案“不外课程与钟点之变通,非有大改革也。”

在“文实分科”实行时遇到重重阻力,各地意见纷纭的情况下,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1年1月26日),学部又向朝廷提出改定1909年原定课程计划的奏章,并提出三个理由^[8]:

第一,“中学教员养成于优级师范,而学生则取材于高等小学,学科编置本属息息相关”,造成教员不适应文实分科中学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程度;

第二,文实分科导致学校设备问题,“分科设备较旧加繁,理化试验消费尤艱”。如果按规定来配备,则“非惟财力不足,且虞校室不敷”。且国家规定各府必须设一所中学,考虑到全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贫瘠之区尤难筹画”,如果求全责备,则“恐转碍教育之进行”;

第三,中学文实分科仿自德国,“仍以养成国民常识为主”,文实分科的做法,“因趋向之各殊,致涂径之悬绝”,一旦分科,后日要转学就很难了。

基于以上理由,学部认为需要重新安排各门课程,同时呈报改进后的课程计划,这时的“文科”与“实科”较相近。遗憾的是,清末“文实分科”如同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此时正值战乱时期,全国各地的学校大多停办。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按照民主共和的原则,改革教育中的封建因素,恢复全国的教育。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教育界人士总结“文实分科”的流弊有三个^[9]:第一,使学生学科知识有所偏重,基础知识缺乏,不利于中学毕业后的就业,与升学也没有衔接,而且文实两科课程悬殊,使学生难以转学;第二,分科为时过早,儿童心智还未成熟,容易造成畸形发展;第三,教育经费紧张,师资、教室、设备等条件难以配合,同时也限制了实科学学校的发展,使得各类学校发展不均。

1912年9月颁布《中学校令》,明确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这一宗旨明确了中学是国民教育,纠正清末中学教育偏于升学的现象,以期造就健全合格的国民。因此,旨在进行升学准备的“文实分科”被取消了。

三、文理分科的再度提出与取消

1915年1月22日,袁世凯颁布《特定学务纲要》,认为中学校学制,各科并重,自初小高小以至中学课程,“迭次圆周,既嫌复沓,而于造就社会中

坚之人物与高等教育之预备,均有不能独到之处。”于是,决定“取法德制分为文科、实科二种,或分校、或一校兼备二科,视生徒之志愿以入学,不特适于天性,且学科有所偏重,造诣自有专长,将来毕业后出任事业,能力较优,自足为社会之中坚人物,即升入专门大学亦易深造,较现制实为便利。”^[10]但这次文实分科未等实行,即随袁世凯的倒台而付之东流。

同年(1915年)4月,第一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天津召开,鉴于壬子癸丑学制中中学阶段的弊端逐渐突出,湖南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的提案,也提出中学文实分科的要求。提案指出,因为清末采用文实分科制度未能见效,就得出“德制不宜于吾国”的结论,怀疑“文实科教育之不良”,“是直谓之因噎废食而已”。提案认为,清末中学文实分科之所以未见效的原因为^[11]:其一,“清制就原有中学而分文、实两科于一校之内,以一校而含二种之目的,精神不得贯彻,办理难于适当。”其二,“以一校而兼二种之组织与设备,难于完善。”其三,“以五年不完备之文、实科,置于高等学堂之下,既无独立作用之组织,复无高等学问之基础,其效用不得昭著。”其四,“学制之全系并无贯彻之组织,办学学者因而不能操一定之把握,了然于胸中;遂因设备组织之困难而群疑其不利。”其五,“清时之文、实科中学,大率仅因组织、设备之困难而疑其非吾国国情之所宜,并非因此种教育不适于国民,而求他种教育上之改善。”由此,议案要求改中学校为文科学学校、实科学学校、副文科学学校、副实科学学校。

1916年11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议决通过了《中国教育改良办法案》,重新申明“中学校本以完足普通教育为原则”,尤其对“文实分科”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创文实分科者,是更甚其预备教育之意,与中等社会普通应用相去甚远,毕业生之位置,除升学外将一无所有矣”。同时各省区代表的报告显示,中学生毕业后能继续求学者,仅十分之一,或不及十分之一,其中不升学而无事可做的人,又占大多数,因此呼吁办学学者不能以“极少数人之升学,牺牲多数人之生计”。^[12]

为统一各方面的意见,1919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学校长会议,“文实分科”成为讨论的焦点,将清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推向高峰。教育部交议案内容中提出“文实分科”问题,浙江会员也提出了《中学校宜分社文实建议案》。讨论中江苏代表四中校长章赋洌、五中校长童伯章、八中校长李更生、南高师附中主任陆规亮一致同意“文实分科”,得到各省代表的支持。其理由可归结为^[13]:其一,中学课程分十五科三十多个门类,学科太多,若平均用力,“所求愈奢,所得愈俭”;其二,“学科既多,兼营并骛,其敏锐者,虽博闻强识,而实鲜贯通。其鲁钝者,则顾此失彼。而终无一得”,且学生负担

过重,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中学三四年级生,勤学者辄见神经衰弱之症”;其三,无论学生升学或就业,学业和事业都各有专精,文实殊途,互不为用,中学虽奋力学习,不久即被遗忘;其四,对于职业者,需要是一门技术,应当以专精为适用。如果所学博而不精,“投身其间,立见窘拙”。要解决这四大弊端,“莫如分中学校为文实分科”。但“文实分科”并不等于对文科或实科一概不学,只是各有侧重。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育部视学李步青等表示了反对意见^[14]。

1922年,教育部制定“壬戌学制”,延长了中学修业年限且分为初级、高级两个阶段,在高级中学阶段实行选课制与分科制。规定“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

“新学制”实行之后,各地高中普通科多采文理分组的办法,虽然设有选修科目,但往往“重文轻理”,结果出现了高中毕业生理科成绩低劣的情形。因此,1929年教育部再次取消了文理分科,设置选修科目,采取学分制,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1932年,教育部公布《初高中各科课程标准》,改学分制为学时制,并且取消选修科目,高中教育又回到了不分科的状态。1933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确立教育目标改革制度案”中,明确规定“高中不分文理科,现有之工农商等高中,均应改为职业学校”。

1940年教育部颁布“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同年,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实行分类选修制度,高中分甲、乙两组,分别侧重理、文教育。直到1948年,又取消高中的分类选修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文理分科模式长期存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现象越演越烈。

回顾我国中学(高中)文理分科百年的历史,以时间为维度是分多合少、以分为主,分合反复无常。这期间,文实分科的发展就像钟摆一样寻找最佳点的过程,但却始终不能停留在最佳点上。“高中文理分科,分还是不分?这是一个问题”^[15]。对于这个问题,赞成者与反对者仁者见仁,智者见者,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当前应对文理分科问题进行“冷”思考,毕竟取消文实分科不是一场单兵突进的戏。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分科与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对高中重新进行定位。因为高考制度才是文理分科模式的制度温床。为此,高考改革有多难,文理分科存废之争的路就有多远。

注释:

[1]Tanner,D.&Tanner,L,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ory into practice . (2nd ed).New York: Macmillan,1980.Chap5.

[2]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1909年学部奏请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学部官报》147期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910年1月21日)学部通行各省提学使详报变通中学办法筹办情形文,李桂林、戚名诱、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287页.

[4][5][6]李桂林、戚名诱、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别第324页,336页,317页.

[7]宣统二年(1910)直隶提学司详直督变通文实分科文[J],教育杂志,1910,(3):5-18.

[8]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学部奏改订中学文实两科课程折(并单)[Z].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册第1-7页.

[9]卢红玲,民国早期中学教育研究(1912-1917)[D].河北大学,2006.

[1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841页.

[12][13]李桂林、戚名诱、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别第811页,第815-817页.

[14]陆殿扬,江苏省立中学学制变更的历史观[J],教育杂志.1922.

[15]刘海峰,文理分科乎[J].中国教育报,2009.
(柯莉群 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季·檀歌·散板

我心美丽

○张 晶

秋日的午后,邀上好友,咖啡馆小憩,惬意,悠闲。喜欢这里的感觉。一幢欧式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之间,远远望去,古朴,幽雅。咖啡宣传牌,是用粉笔写的,有种怀旧的老上海的味道。几株绿萝顺着洁白的墙壁悠然垂下,静静地,好像在诉说着它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窗外不远处,是一棵高大的古树,小半的叶片已经变黄。错落,点缀。别有一番风韵。

服务员不多,也不够漂亮,但温婉、耐心、细致。尤其吸引我的是那些很有质感的咖啡器具以及吧台后边那些好看的杯子,一切都是那样的静谧而有品位。

喜欢这里不光是因为环境,更因为这里总能带给我一种思考,一种淡然,一种美丽的心情。

有时候适当的环境或许真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被那群小家伙搞的身心疲惫,需要调整放松的时候,或者遇到事情想不出头绪,需要灵感的时候,可千万别傻傻地坐在办公室,或憋闷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去,找个喜欢的地方,一本书,或是三五好友,尽量地放松自己,或许在不经意间,你会豁然开朗。

前一阵子,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班的“小糊涂虫”又开始“打瞌睡”了。根据他的种种表现,我知道,他的家长肯定又把他独自扔在家里,不管他了。这两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马上和家長取得联系,一开始,家長很在意,都会采取一些办法来扭转局面,可时间一长,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任凭老师怎么强调,都无济于事。眼看着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孩子整天浑浑噩噩,我的心真是说

不出来的滋味。

好好训他一顿吧?不行,那样他会越发糟糕;再次和家長联系?也不行,与其听家長说那些没完没了的理由,还不如自己想办法;要不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谈谈?哎,更不妥,这办法用了太多次,早已不奏效。棘手!

要是老师和孩子之间也有那么一个场所,可以放松身心,平静的交流,那该多好啊!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空间不大,但温馨,舒适。所有的布置、摆设都尽量以柔和的色调为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角落里的那块区域,它的设计灵感最先来源于美国的一种教育理念,席地而坐,随手可拿质感柔软的毛绒玩具,或是暖融融的靠垫,把它们抱在怀里,让孩子充分地享受安全感,享受身心的真正放松。我想,这不仅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同样的,对我们老师也有帮助,当你的心平静、安适的时候,你的语言一定是科学的,智慧的,充满关爱的,就如同春雨一般,或许不必多言,但孩子却已读懂了你的心意。。

那天的交流本来预计要一节课的时间,可仅用了半个小时,话真的不多,可从他的泪水和眼神中,我读懂了他的决心与悔意。我想,即便不能帮助他永久地走向阳光,但我们做老师的,心安了,尽力了!

说了好半天,你一定猜出这是哪里了吧?对,就是我们学校三楼的心理健康辅导室。亲爱的战友们,这真是个好神奇的好地方,当你班上的“小刺头”三番五次让你头痛时,不要着急,不要生气,不如,悄悄地,拉起他的小手,来到这个心灵天地吧,或许这里真的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思绪就这样自由的驰骋着。忽然,一缕阳光从玻璃窗上透进来,满屋子弥漫着咖啡的香气,窗外的绿萝也好像停止了诉说,全然陶醉在这幸福,安然的味道里。

所以,不要再走的那么快,坐下来,点一杯咖啡,靠在窗边,静静地看时光从指间划过,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竟是那么的惬意,只是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忘记了品味,忘记了阅读生活的美丽。

(张 晶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310004)